

# 大西欧罗巴:明人对欧地理认知新突破

庞乃明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市 300071)

**摘要:**在前代认知基础上,明代中国以东来欧洲人为认知媒介,第一次以欧罗巴指称欧洲,第一次以天主教指称欧洲宗教,第一次描述记录欧洲数十国家和上百地区,第一次多方介绍欧洲先进科技文化,第一次揭露批判欧洲海外殖民扩张,对欧地理认知实现重大突破。但又存在地理信息质量不高、认知内容轻重失衡、认知成果难有实效等内在缺憾。

**关键词:**明人;欧罗巴;地理认知;突破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3-0052-07

地理认知是推进域外认知由表及里的第一环节。在古代中国人之对欧认知结构中,地理认知明显处于前置和先导地位。早在两汉时代,以丝绸之路为媒介,古代中国人就已形成一定的欧洲地理观念。但迄明初以前,他们对于欧洲地理状况的了解其实相当有限。延至明中后期,伴随新航路的开辟,中欧间的直接交流空前活跃起来,大量欧洲信息通过各种渠道汇聚中国。在此背景下,明人放眼欧罗巴,关注欧洲地理人文,古代中国人之对欧地理认知由此出现新的重大突破。

从两汉时代开始,地处欧亚大陆西端的欧洲就不断引发中国人的无限遐思和浓厚兴趣。当时虽无直接交流,但人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欧洲信息,还是促成有关欧洲地理知识的从无到有和不断突破。在《史记·大宛列传》里,司马迁列极西四国,其中的“黎轩”即指罗马帝国。司马迁说:“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sup>[1]卷123《大宛列传》</sup>将罗马帝国置于安息之北,大月氏西北。《汉书》则通过介绍乌弋山离,间接标注黎轩地理位置:“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西与犁靬、条支接。”<sup>[2]卷97上《西域传上》</sup>东汉时期之中国人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后汉书·西域传》云:“大秦国一名犁靬,又名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西方大国。又曰:“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魏晋时期,经由海路亦可到达大秦。《太平御览》引《吴时外国传》称:“从迦那调洲(今印度科罗曼德)乘大舶,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大秦国也。”<sup>[3]卷791《洛阳伽蓝记》</sup>云:“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陲”<sup>[4]卷4</sup>,视大秦为远在天边的西方国家。《三国志·魏书》注引《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置大秦于安息、条支西,基本解决了条支与大秦的方位错乱。该书还计算出从安息到大秦的水程时间:“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对于大秦西邻之地理状况,《魏略·西戎传》写道:“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

\* 收稿日期:2010-09-10

作者简介:庞乃明(1966-),男,河南正阳人,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明史及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欧洲势力东渐与晚明社会变迁”(10BZS022),项目负责人:庞乃明;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欧洲势力东渐与晚明社会变迁”(AS0905),项目负责人:庞乃明。

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国、坚沙国、属由国、月氏国,四国西有黑水。所传闻西之极矣。”

唐称东罗马帝国为“拂菻”。《旧唐书·西戎传》云:“拂菻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新唐书·西域下》曰:“拂菻……去京师四万里,在苦西,北直突厥可萨部,西濒海,有迟散城,东南接波斯。地方万里,城四百,胜兵百万。”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以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在对外交往中突出强调与原罗马帝国的承继关系,所以唐人将拂菻等于大秦。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大拂临国》称,大拂临位于小拂临隔海之西北,“此王兵马强多,不属余国。大寔数回讨击不得,突厥侵亦不得。土地足宝物,甚足驢、骡、羊、马、疊布等物”。所谓大拂临实指东罗马帝国本土,小拂临则指拜占庭在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之属地。在《经行记》的帮助下,《通典》大体测算出东罗马与中国之间的遥远距离:“从条支西度海曲万里,去长安盖四万里”<sup>[5]卷193《边防九·大秦》</sup>。宋人记载之拂菻位置较唐代东移。一般认为,宋代拂菻国已经不是原来的东罗马帝国,而是11世纪中叶以后占领小亚细亚大部的塞尔柱帝国。但赵汝适《诸蕃志》所记“芦眉国”,可以认定为今亚平宁半岛一带。《诸蕃志》云:“自麻啰拔西陆行三百余程始到。”<sup>[6]卷上</sup>此麻啰拔本指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住叙利亚安都城总主教,这里乃转指地名,即从安都城往西陆行三百余程,可到芦眉国。所记“斯加里野国”,则指今意大利西西里岛:“斯加里野国,近芦眉国界,海屿阔一千里”<sup>[6]卷上</sup>。元人称欧洲为“拂朗”或“富浪”,认为拂朗位于西域之西,近于太阳落山之处。从拂朗到中国要七渡大洋,历时四年。

延至元末明初,古代中国人已经累积了可称丰富的欧洲地理知识。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发现1402年由朝鲜李荃、权近绘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在1330年左右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和1370年左右僧清浚《混一疆理图》的基础上综合而成的。两幅由中国人绘制的地图已经失传,但从朝鲜保存下来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元末明初中国人的欧洲地理知识。李约瑟说:“图中的西方部分很值得注意,其中一共有将近100个欧洲地名……地中海的轮廓画得很好……德、法等国的国名均用音译(A-lei-man-ia和Fa-li-his-na),而且还绘上了亚速尔群岛……从这幅地图可以看出,绘图者所掌握的西方地理知识是相当广博的,比欧洲人当时所掌握的中国地理知识明确得多。”<sup>[7]第五卷第一分册,p154-155</sup>但是,随着元朝的灭亡和明初海禁政策的强化,特别是郑和大规模远洋航行的结束,中国人的欧洲地理知识日渐萎缩,以至葡人东来以后,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皆不知其国之所在。

明人欧洲地理知识的快速增加,主要得益于明中后期的中欧直接交往。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势力竞相在远东地区开展殖民贸易,中国与欧洲有了直接交往。通过直接交往,明代中国人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的地理状况有了初步了解。<sup>①</sup>万历以后,耶稣会士相继来到中国。他们华言华服,中文著述,在推销天主教的同时,也把欧洲地理知识介绍到中国。其中以利玛窦、艾儒略影响最大。

万历十一年(1583年),利玛窦进入广东肇庆。当他发现中国各省乃至重要城镇都有地图时,便把自己携自欧洲的世界地图张挂于会院外厅。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使前来参访的肇庆士民甚感奇异。应知府王泮请求,利玛窦将地图中的拉丁文说明译成中文,并对地图稍加改动,移中国位置于偏中。利玛窦中文世界地图震撼了晚明知识界,正是通过这张地图,晚明中国人开始“发现”欧洲,认识欧洲,逐步形成对欧地理认知。以万历三十年李之藻刊印之《坤輿万国全图》为例,可约略窥见利玛窦所传欧洲地理知识之一斑。在原图第一至第三页总论部分,利玛窦说,地分五大州,欧罗巴居其一,并用地域四至说明欧洲地理范围:“南至地中海,北至卧兰的亚及冰海,东至大乃河、墨何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第16页介绍欧罗巴州总体状况:“此欧罗巴州,有三十余国……土产五谷、五金、百果,酒以葡萄汁为之……去中国八万里,自古不通,今相通近七十余载耳。”第13页简介欧洲各地情况。其论谿厄利亚曰:“谿厄利亚无毒蛇等虫,虽别处携去者,到其地即无毒性。”此言英国之特殊气候地理环境。介绍入尔马泥海称:“入尔马泥海出琥珀,生石上,如石乳然,多在海滨,金色者为上,蓝色次之,赤最下。”此言靠近德国北部之波罗

<sup>①</sup> 参见拙文《明人佛郎机观初探》,《兰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明人荷兰观探悉》,《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的海特产琥珀。其论入尔马尼亚诸国条曰：“入尔马尼亚诸国共一总王，非世及者。七国之王于中常共推一贤者为之。”此言日尔曼皇帝从七大选侯中选举产生，而非世袭。罗马条曰：“此方教化王不娶，专行天主教之教，在罗马国，欧罗巴诸国皆宗之。”此言教皇常驻罗马，为欧洲精神领袖。凡此等等，皆明人闻所未闻。

成书于天启三年(1623)的艾儒略《职方外纪》，是一部影响巨大的中文世界地理专书。该书第二卷以十三子目系统介绍欧罗巴。其总说称，欧洲为“天下第二大州”，“其地南起地中海，北极出地三十五度。北至冰海，出地八十余度。南北相距四十五度，径一万一千二百五十里。西起西海福岛初度，东至阿比河九十二度，径二万三千里。”“共七十余国。其大者曰以西把尼亚，曰拂郎察，曰意大里亚，曰亚勒玛尼亚，曰法兰德斯，曰波罗尼亚，曰翁加里亚，曰大尼亚，曰云除亚，曰诺勿惹亚，曰厄勒祭亚，曰莫斯科未亚。其地中海则有甘的亚诸岛，西海则有意而兰、大谙厄利亚诸岛云。”然后介绍欧洲宗教、风俗、物产、建筑、教育、法律、军政等。以下分九目分叙以西把尼亚、拂郎察、意大里亚、亚勒玛尼亚、法兰德斯、波罗尼亚、翁加里亚、大泥亚诸国(凡四大国：大泥亚、诺而勿惹亚、雪际亚、鄂底亚)、厄勒祭亚、莫斯科未亚，最后二目则介绍地中海和北海岛国。《职方外纪》对欧洲自然和人文地理的描述大体符合欧洲实际，为明人形成较为系统的欧洲地理观念提供了重要素材。除《职方外纪》外，艾儒略还著有《西方问答》，上卷介绍欧洲国土、路程、海舶、海险、土产、制造、国王、官职、服饰、风俗、法度、交易、饭食、医药、宫室、城池、兵备、婚配、葬礼、祭祖等，下卷讲述欧洲地图、历法、年号、西土、术数等。其中有关物产、民情、风俗的叙述相当详细。

## 二

对明代中国人而言，“欧罗巴”显然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新名词。晚明李应试《刻两仪玄览图》称：“无论国朝二百余年，即三代以继今之父老，蔑闻欧罗巴何。”<sup>〔8〕</sup>下编《文献整理》，p171 如此，则中国之欧罗巴称谓始于何时？有可靠证据表明，古代中国以“欧罗巴”指称欧亚大陆西端的这块陆地始于明朝。利玛窦在其中文世界地图中最早将拉丁语 Europa 音译为“欧罗巴”。由于该图的广泛传播，此一称谓流布渐广，以至后来约定俗成，逐渐成为欧洲的正式名称。但明人对欧称谓远不止欧罗巴一名，见于官私文献的欧洲名称还有胡洛巴、欧罗巴州、欧罗巴国、欧逻、大西、大西国、西国、大西域、西域、泰西、远西、极西之国、西极、西天、西方、大西洋、大西洋国、西洋、西洋国、西海、欧海国、天主国等数十种之多。<sup>①</sup> 这些称谓大体从四个层面反映了明人对于欧洲的地理感受：译名欧罗巴，居中国最西，濒临大西洋，信奉天主教。

欧洲既居中国最西，或云大西，或曰西极，或谓泰西，其精确地理观念如何建构？徐应秋、程百二、方以智等接受利玛窦所传欧洲地理新知，用地理四至的方式确定了这个极西大洲的具体位置：“南至地中海，北至卧兰的亚及冰海，东至大乃河、墨何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sup>〔9〕</sup>卷22《四荒所届》[10]《外夷卷一》[11]卷11《天文·历测》保存至今的由晚明士人绘刻的几幅世界地图，如袁启《天文图说》之《大地圆球五洲全图》、冯应京《月令广义》卷首之《山海舆地全图》、王圻《三才图会》地理卷一之《山海舆地全图》，皆将欧罗巴洲标注在亚细亚之西、利末亚与地中海之北。这种地理安排无疑是相当正确的。程百二甚至列出欧洲数十国家与上百地区之经纬度。但具如此观念者究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晚明士人只是模糊认识到了欧洲地处遥远的西方。而“西”之遥远程度，则颇难精准。在此情况下，利玛窦泛海三四年、航行八万里的来华陈词，就成为明代中国人判断欧洲地理方位的重要依据。他们多以欧华距离和航海耗时间接指出欧罗巴洲的方位所在。

在欧华距离上，明人多持八万里说。除此之外，邹维琏持四万里说，方以智持五万里说，李日华、章

<sup>①</sup> 参见拙文《明代中国人的欧洲称谓述略》，《历史教学》2004年第6期；《从对欧称谓看明人欧洲观》，《明史研究》第十辑，黄山书社，2007年。

潢持六万里说,杨廷筠、叶向高、王应麟持九万里说,王家植、陈民志、李贽等持十万里说。<sup>①</sup> 另有部分人士难以确定欧华距离,姑作存疑处理。沈德符就说:“玛竇白云,其国名欧罗巴,去中国不知几千万里,今琐里诸国,亦称西洋,与中国附近,列于职贡,而实非也。”<sup>[12]</sup>卷30《外国·大西洋》明人有关欧华距离的认识差异,主要在于彼此依据有所不同。清人傅维麟说:“欧罗巴居中国之最西,自古未通中国。明朝西商循小西洋东来,贸易于广东之香山澳。嗣后其国名道倡者,每附其舶而来,以人非一国,故计其里有八万、九万,亦有近十万者。皆以海程计,势迂回。若有陆路可通,不过五万余里。”<sup>[13]</sup>卷166《四国传二·欧罗巴》在来华航海耗时上,有二年说、三年说、四年说、五年说,亦有六年、八年说。诸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利玛竇泛海三四年自我表白也不可靠。据《利玛竇中国札记》记载,1578年3月24日,利玛竇等由里斯本航海,同年9月13日到达印度果阿。经停将近四年,然后继续东行,于1582年8月7日抵达澳门。在澳门停留一年有余,后于1583年9月10日到达肇庆。其真正用于海上航行的时间只有九个半月。当然,并不是所有明代中国人都把欧罗巴洲看成是遥远的极西之地。姚旅就通过来华耶稣会士之口了解到欧洲距华并不甚远。他说:“罗华宗者,西洋人,慕华而至华……余问西洋布出若国乎?答云,彼小西洋,吾所居大西洋,在京师之昔(西)北海中,去京师不远,阻于鞑靼,不能飞越,故必至南海焉。自西洋至南海,须阅三岁。”<sup>[14]</sup>卷9《风篇》中

当然,明人对欧地理认知并不仅仅局限于自然地理。在自然认知的基础上,晚明士人对于欧洲人文地理亦有丰富认知。程百二说:“欧罗巴……一切异端不从,独崇天主教。不信轮回,而极信天堂地狱之说。古国人多去家修行,既巨家费,弃而不顾。男人三十以外乃娶,无二室者。百姓如此,君公亦如此。有三十余国,各有国主统之。另有教主。其教主不娶,即国主尊师之。官有三品。其上主兴教化,其次判理俗事,其下专治兵戎。土产五谷金银百果,酒以葡萄汁为之。工皆精巧。通天文性理,俗敦五伦,人好远游。”<sup>[10]</sup>《外夷卷一》此说虽褒美有加,但大体道出了欧洲人文概貌。一些人阅读了利玛竇之《交友论》,称欧洲人“重交道”<sup>[15]</sup>卷4《游居栢录》、“重友谊”<sup>[16]</sup>卷4《时事漫记·利玛竇》。一些人参观过来自欧洲精美图书,惊叹欧洲书籍“其种甚广,各极其妙”<sup>[17]</sup>卷6周子思《表度说序》。一些人了解了欧洲学术,称远西之学“精实典要,洞无可疑”<sup>[18]</sup>卷2《刻几何原本序》。一些人赞赏欧洲的科学技术,积极引进传播之。而有关欧洲的海外扩张,又成为另一些晚明士人讨论的热门话题。周之夔分析了欧洲称雄海外的原因。他说:“西洋本猾黠小夷,多故巧,能制玻璃为千里镜,登高远望,视邻国所为,而以火炮伏击之。故他夷率畏其能,多被兼并,以此称雄于海外。”<sup>[19]</sup>卷3《破邪集序》苏及寓揭露了欧洲殖民者殖民海外的处心积虑:“此番机深谋巧,到一国必坏一国,皆即其国以攻其国,历吞已有三十余。远者难稽其踪,最近而吕宋,而米素果,而三宝颜,而鸡笼、淡水,俱皆杀其主夺其民。”<sup>[19]</sup>卷3《邪毒实据》甚至记载了他们控制亚洲殖民地人民的各种“毒法”:<sup>[19]</sup>“数十里为一保,保外不许相通。人授里票为准,票志姓名形貌,有越保而行者,有行无里票者,皆斩无赦。里中设邪寺,妻女驱入淫。又尝抽子以别母,抽夫以离妻,或抽本乡倏居别国,或抽此土倏往他邦。东西变换,南北移易,盖皆所以令熟者生,强者弱,勇者不得相通,智者不得相谋。是奸夷所以御吕宋、三宝颜、米素果等之毒法也。”<sup>[19]</sup>卷3《邪毒实据》黄廷师说,欧洲殖民者“杀诸国主而袭其国,遂设五院,一曰仙多罗明,一曰仙巴难丝索果,一曰仙阿牛实丁,一曰仙弊里氏,一曰仙但耶。此五院等番,俱名巴礼,分五项备用。如遇斗争,则以仙弊里氏往;遇施与,则以仙巴难丝索果往;遇讲和解纷,则以仙但耶往。至若教人文字,则仙

① 邹维琏在论及荷兰方位时曾说:“看得红毛一番,远去中国四万里,晨昏昼夜皆相反。”(《达观楼集》卷18《奉剿红夷报捷疏》)据此,邹维琏似已知道欧洲与明朝分处东西两个半球,两地相距四万里。方以智称:“欧逻于中国,则日出差七时有余矣。”(《物理小识》卷1《历类》)两地时差七时,则经度相差210度,以250里一度计算,中欧相距约为五万里。李日华持六万里说,他说:“大西国在中国西六万里而遥,其地名欧海国。”(《紫桃轩杂缀》卷1)章潢也说:“自中国及小西洋,道途二万余里,使地止于兹,谓之有穷尽可也。若由小西洋以达大西洋,尚隔四万余里。”(《图书编》卷29《舆地山海全图叙》)杨廷筠持九万里说,其《代疑篇》云:“问西士,自言从欧罗巴国,历九万里程。”(《代疑篇》卷上《答九万里程途,涉海三年始到条》)叶向高说:“泰西氏去中国已九万里,自上古未尝通。”(《职方外纪》卷首《职方外纪序》)王应麟亦云:“大西洋土利玛竇,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熙朝崇正集》卷2《钦赐大西洋陪臣葬地居舍记》)王家植持十万里说,所作《题畸人十篇小引》曰:“西国去中州十万里,有天有地而不能相通,通之自利子始。”(朱维铮主编《利玛竇中文著译集》第505页)陈民志说:“夫西泰子经行十万里,越廿 而届吾土。”(朱维铮主编《利玛竇中文著译集》第225页《陈民志跋》)李贽《与友人书》亦云:“承公问及利西泰,西泰大西域人也,到中国十万余里。”(《续焚书》卷1)

阿牛实丁司之。而在仙多罗明，则专持其邪说邪术，诱惑邻国。”<sup>[19]</sup>卷3《驱夷直言》把所谓殖民五院视为欧洲控制殖民地的重要工具。这些看法虽参杂传闻，真伪互见，但却反映了明代中国人认知欧洲的敏锐眼光。

注重了解欧洲具体国家地理状况，是明人对欧地理认知实现突破的显著标志之一。除前述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外，明人文献对英国、意大利、俄罗斯、法国、德国、波兰等国地理人文状况亦有一定记载。明代中国人称英国为谟厄利亚。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描述了英国吞吐海潮的“海窖”<sup>[20]</sup>卷2《地类》、食则致人笑死的“榘尔多泥”草<sup>[20]</sup>卷6《饮食类》、猛可搏杀狮虎的“谟厄利亚犬”<sup>[20]</sup>卷10《鸟兽类》。称意大利为意大利里亚。程百二说：“意大利里亚，地狭而丰厚，上下二海所围，人民众盛。古因罗马为四方邻国总主之都，今教主居之，各天主教人往来络绎。罗马其王不娶，专行天主教，欧罗巴诸国皆从之”<sup>[10]</sup>《外夷卷一》。称威尼斯为勿耨茶：“勿耨茶，在海中，作石砖高房，城郭坚美。其国无君主而国治。每年大家众人选贤者管事，事毕则为平人。富庶之地，手工艺绝巧，土产上等玻璃。”<sup>[10]</sup>《外夷卷一》客观反映了威尼斯的水城特征、特产玻璃及其城市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明人称俄国为没厮个未突或没斯个，实即莫斯科公国。程百二《方輿胜略·外夷卷一》说：“没斯个，地甚冷，不产果木。”称法国为拂郎察，指其善用大统。称德国为入尔马泥亚：“入尔马泥亚，诸国共一总王，其国之王，于中常共推贤者为之。”“出琥珀，金色者为上，蓝次之，赤最下。”<sup>[10]</sup>《外夷卷一》称波兰为波罗尼亚：“波罗尼亚，国王卒而嗣子贤，则大臣立之为君，否则请他国之贤者立而君之。”<sup>[10]</sup>《外夷卷一》

### 三

如前所述，明代中国人第一次以欧罗巴指称欧洲，第一次以天主教指称欧洲宗教，第一次精确指出欧洲地理四至，第一次描述记录欧洲数十国家，第一次列出欧洲数十国家与上百地区经纬度，第一次多角度介绍欧洲先进科学技术，第一次揭露批判欧洲在海外的殖民扩张，这些确是对欧地理认知的重大突破。对一些时人极易混淆、以讹传讹的重要地理问题，竟也有人能够辨析区分。与来华耶稣会士多有接触的天主教徒韩霖，即就所谓佛郎机问题“博采舆论”，明辨讹误。他说：“红夷本国为阿兰大，吕宋本国为意西把泥亚，香山番夷本国波尔度瓦尔也。三国皆远在数万里外……佛郎机亦西夷国名，此中国火器所自始，以之称澳夷，非也。”“以吕宋为佛郎机……则系讹传。”<sup>[21]</sup>卷5之1《协力篇》卷尾《小论》这是说别称红夷的荷兰、殖民吕宋的西班牙、租居澳门的葡萄牙，都是远在数万里外的欧洲国家，而佛郎机是另一欧洲国家，指澳门葡人为佛郎机，以吕宋西班牙人为佛郎机，都是讹传错误。这一认识结论既将佛郎机之讹传错误予以指出，又将葡萄牙与西班牙明确区别开来，确为当时所少见。一些人具体描述了欧洲来华之海上航线。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三柱石之一的杨廷筠说：“西士来此由水道，必取赤道北，过赤道南，经大浪山，再转过赤道北，涉海三年，方抵广东。”<sup>[22]</sup>卷上《答佛由西来，欧罗巴既在极西，必所亲历，独倡言无佛条》杨氏所谓“水道”，实即达·伽马开辟之海上新航线。所谓“取赤道北”，“过赤道南”，即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穿越赤道。“大浪山”是明人对好望角的一般称呼。好望角原称风暴角，风急浪大，浪高如山，故称大浪山。所谓“经大浪山，再转过赤道北”，即过大浪山后折而东北行，经印度洋，再越赤道，到达印度，经停印度后到达中国。明末另一天主教儒者王征作于崇祯十年的《杜奥定先生东来渡海苦迹》，则详细记载了大浪山以东的海上行程：“杜先生者，远西欧罗巴州意大利亚国士也……奉教化皇命，来我东土……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二十六年九月间，从罗马府起程登舟……过大浪山脚，大风雨两日夜，莫知所往……不意渡至若望那德模海岛傍……舟诣黑人国摩颞比格府……居府一年，始弃舟，将两月，至小西洋；小西洋八阅月，乘舟东来，又两月始抵广东香山。”王征所谓“摩颞比格府”，即今东非之莫桑比克；所谓“小西洋”，即晚明印度之别称。王一筠甚至提及哥伦布之环球航行，称：“阁龙虑海外有国，声教不通，乃远出寻求，广行教化。”<sup>[23]</sup>卷4末尾《书墨瓦蜡尼加后》这些认知实则代表了明人欧洲地理知识的较高水平。

但又不可否认，已经取得重大突破的明人对欧地理认知还是存在不少缺陷。翻检明人文献，有关欧洲历史沿革、人口分布、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情况少有记录，人们不了解欧洲历史的发展脉络，不清楚区域人口的分布状况，不知道欧洲经济的特色所在。有关欧洲地形、气候之描述极其贫乏，阿尔卑斯山、多瑙河等名山大川只字未提，丘陵、低地、海港等亦难觅踪影。从叙述的侧重看，对西欧、南欧、中东欧的记载

描述相对较多,对北欧的记载描述非常稀少,没有实现对于欧洲全境的均衡了解。从具体国家看,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的记载描述较多,对其他国家的记载描述相对较少。这是因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是明中后期涉足中国东南沿海的三个欧洲国家,<sup>①</sup>与明朝发生过直接政治经济联系,而意大利罗马为教皇驻在地,来华传教士如利玛窦等多为意大利人。从认知内容看,明人对欧洲宗教文化的宣传批判较多,对一般地理状况的客观介绍较少,人文地理的认知内容远多于一般自然地理,认知内容畸轻畸重。从认知态度看,对欧洲社会的理想描绘或情绪化否定较多,理性中立的一般叙述较少,反映出因中欧宗教文化差异而引发的两种截然相反的非理性态度。从地理信息的搜集获得看,明人欧洲地理信息的来源比较单一,质量有待提高。域外地理知识的积累获得,既需要来自外部的间接地理信息,更需要亲历亲探的直接地理信息。新航路开辟后欧洲人世界地理知识的迅速增加,即与其环球航行及海外探险大有关系。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明代士人不曾亲履欧洲,未能实现与欧洲的零距离接触,<sup>②</sup>无法深切体验欧洲自然人文的真实感受,也就不可能获得有关欧洲自然人文的第一手资料。加之不懂欧洲语言文字,不能自主阅读欧洲地理书籍,无法从西方文献中自主获得欧洲地理知识,而全凭东来欧洲人尤其是来华耶稣会士的一面之词。由于无法改变由对方控制信息、垄断信息的被动局面,明人获得的欧洲地理信息几乎全是经过来华耶稣会士加工改造过的,不可避免地存在轻信盲从、被人误导之处,这就导致一些认识的偏差错误,无法实现对欧地理的准确认知。由于传统华夷观念的负面影响,一些人还存在“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保守观念,对域外认知缺乏兴趣,对欧洲地理信息不做主动了解和认真收集,这就使得晚明时代具备欧洲地理知识者只占极少部分,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欧罗巴仍然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未知区域,与他们风马牛不相及。

不唯如此,明人对欧地理认知还远未取得一致,某些方面甚至争议很大。一些人不承认中欧之间相距遥远,特别是那些天主教的反对者,他们认为传教士的祖国就在吕宋、满刺加、琉球或香山澳附近,所谓数万里远者,不过是麻痹中国人的托词而已。沈 是万历末年发动“南京教案”的著名反教人士,通过一番调查,自认摸清了传教士的籍贯所在。他说:“臣近又细询闽海士民识彼原籍者,云的系佛狼机人。其王丰肃者,原名巴厘狼当,先年同其党类,诈称行天主教,欺吕宋国主而夺其地,改号大西洋。然则闽粤相近一狡夷尔,有何八万里之遥?”<sup>[19]卷1《南官署牍·参远夷三疏》</sup>另一反教人士黄廷师宣称:“按此种出于东北隅,为佛狼机,亦为猫儿眼。其国系干丝蜡,而米索果,其镇头也。原距吕宋不远,所谓数万里者,伪耳。”<sup>[19]卷3《驱夷直言》</sup>苏及寓云:“此夷诈言九万里。夫诈远者,令人信其无异志,而不虞彼之我吞耳。”<sup>[19]卷3《邪毒实据》</sup>在反教人士看来,威胁就在眼前,欧洲近在周边。一些人怀疑、否定欧洲的客观存在。万历二十九年议处利玛窦朝贡事宜的蔡献臣说:“查得《会典》,止有西洋国及西洋琐里国,并无大西洋名色,其远近真伪俱不可知。”<sup>[24]卷1《议处贡夷利玛窦疏》</sup>反教人士许大受认为,所谓大西地名,不过是传教士的人为捏造,子虚乌有,不可轻信。他说:“彼谎言有大西洋国,彼从彼来,涉九万里而后达此。按汉张骞使西域,或传穷河源抵月宫,况是人间有不到者?《山海经》、《搜神记》、《咸宾录》、《西域志》、《太平广记》等书,何无一字记及彼国者?”“万万无大西等说,岂待智者而后知哉!”<sup>[19]卷4《圣朝佐辟》</sup>一些人弄不清欧罗巴与西洋、欧罗巴与佛郎机之间的大小包含关系,如吴中明《坤舆万国全图跋》就说:“利山人自欧罗巴入中国……盖其国人与拂郎机人皆好远游。”<sup>[25]223</sup>直接把欧罗巴与佛郎机等而列之。还有一些人在欧罗巴之外另列大秦、拂菻,对罗马帝国与欧罗巴之间的历史渊源和相互关系不甚了了。更值得注意的是,明

① 英国舰队曾于崇祯年间来华,但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红毛”舰队之一支,有关英国人的在华活动也就记在荷兰账下了。

② 明代士人未能亲履欧洲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世代相延的“自我中心主义”情结,以及强大综合国力造就的盲目自大、孤芳自赏,使明代士人缺乏走向欧洲的内在动力。明代专制政体对官民海外活动的诸多限制,使官员士大夫几乎没有走进欧洲的现实可能。而欧洲殖民商人对中欧贸易的垄断独占,以及远洋航行的巨大风险,也决定着中国商人不可能轻易到达欧洲。(参见拙著《明代中国人的欧洲观》第350页-35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在全球航行渐趋常态化的明朝末年,内外因素的牵扯制约使晚明中国人无法利用欧洲人行之有效的技术优势,实现游历欧美的巨大跨越。因此,至今未见明代士人亲履欧洲的可靠史料。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第一部第三卷第七章,曾经记载三名中国商人于1585年经停墨西哥到达西班牙和更远的其他欧洲国家。但他们既未留下姓名,也未留下旅行记录,更没有得到中国史料佐证。对此说法只能存疑。

人对欧地理认知之既有成果在晚明对欧外交中没有发挥应有作用,明朝统治者尚未充分意识到了解欧洲地理人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未能在决策层面给予积极推动。凡此表明,明人对欧地理认知还有待于不断完善和继续深化。

总之,明人对欧地理认知确实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较高水平,一些认知成果至今沿袭不替,成为明清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亮点所在。认真梳理明人对欧地理认知中的这些问题,对于重新审视明代中国的环球眼光和世界意识,对于塑造再现前近代早期中国的欧洲形象,或有借鉴启示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 李昉,等. 太平御览[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 [4] 杨銜之. 洛阳伽蓝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5] 杜佑. 通典[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 [6] 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7] (英)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M]. 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
- [8] 黄时鉴,龚纓晏.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9] 徐应秋. 玉芝堂谈荟[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0] 程百二. 方輿胜略[M]. 明万历三十八年刻本.
- [11] 方以智. 通雅[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2]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3] 傅维麟. 明书[M]. 丛书集成初编本.
- [14] 姚旅. 露书[M]. 明天启刻本.
- [15] 袁中道. 珂雪斋外集[M]. 明万历四十六年刻本.
- [16] 支允坚. 梅花渡异林[M]. 明崇祯间刻本.
- [17] 徐宗泽.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 [18] 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 徐光启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19] 徐昌治辑. 破邪集[M]. 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本.
- [20] 方以智. 物理小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1] 韩霖. 守圉全书[M]. 明崇祯刻本.
- [22] 杨廷筠. 代疑篇[M]. 天主教东传文献本.
- [23] 艾儒略,谢方校释. 职方外纪[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24] 蔡献臣. 清白堂稿[M]. 明崇祯间刻本.
- [25] 朱维铮.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张颖超